

## 五臺山南山寺印公碑考證\*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 摘 要

五臺山是中國著名的佛教聖地，寺院眾多，佛塔林立，僧才輩出。五臺山南山寺所存「印公碑」記述了元代高僧慧印法師修學和弘傳佛法的事蹟。文章分為三大部分對元代慧印法師進行考證，印公（1271-1337），法名慧印，關陝人，先後在山西、河南等地隨多位高僧學法和受戒，精通《華嚴》《圓覺》《華嚴義疏》《唯識》《因明》等經論，並修持藏傳佛教時輪六支密法等，嚴於戒律，是位顯密兼修的高僧，有榮祿大夫、大司徒封號，銀印一品，地位尊崇。慧印法師的弘法活動主要集中五臺山、大都、上都等地，住持五臺山大萬聖佑國寺，作華嚴法會，並奉詔多次前往兩都講經說法，在大都弘法寺、大永福寺參與校勘經疏活動。最後住持大都大承天護聖寺，捨棄所有用於修建五臺山普門寺和大都寶雲寺。

**關鍵詞：**五臺山南山寺、印公碑、大萬聖、佑國寺、大承天護聖寺

五臺山是中國著名的佛教聖地，寺院眾多，佛塔林立，僧才輩出。元代高僧慧印法師兼修華嚴和密法，弘法活動主要集中在五臺山、大都、上都等地。五臺山南山寺存一通「故榮祿大夫、大司徒、大承天護聖寺住持、前五臺山大萬聖佑國寺住持、寶雲普門宗主、廣慧妙辯樹宗弘教大師印公碑銘」（以下簡稱「印公碑」），講述元代印公慧印法師一生弘法事蹟。學界對於此碑有所涉及，首先溫玉成《五臺山與蒙元時代的佛教》對碑文內容有所引用。<sup>1</sup>之後在《五臺山佛教筭記》<sup>2</sup>一文對「印公碑」進行選擇性錄文，不是全文錄入。後來杯茗只對南山寺碑文進行全文錄入，未作任何考證。<sup>3</sup>杯茗與溫玉成二位先生的錄文存在一定差異，且未對碑銘進行介紹。高明和的《南山寺印公碑並非元碑》對碑陰、碑陽進行介紹，碑陰即為「印公碑」，時間為至元五年乙卯八月，而碑陽則為「欽差敕建五臺山大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重建萬人碑」，時間為大清光緒九年（1883）歲次癸未年孟秋月朔日立。高先生據碑文中出現兩位書丹者，及「李自蹊」名字在碑銘的正、反面兩次出現、功德板上多次出現等情況，認為此碑不是元碑，而是清碑，李自蹊是清光緒年間的人，為大萬聖極樂寺居士。「印公碑」的內容的李自蹊抄自大護聖承天寺智安所立的碑文。<sup>4</sup>尚雨的《南山寺佛教史略》<sup>5</sup>一文也用到「印公碑」的一些內容。實際上「印公碑」中所透露出的很多資訊都值得進一步研究。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碑文進行詳細考證。

## 一、「印公碑」與慧印出家受戒

### （一）印公碑錄文

南山寺，又稱南山極樂寺，在元代稱大聖佑國寺、萬聖佑國寺等，為元大承天護聖寺住持、榮祿大夫、司徒、廣公真慧國師重建。下面將南山寺所存「印公碑」錄文並標點如下：

故榮祿大夫、大司徒、大承天護聖寺住持、前五台大萬聖佑國寺主持、寶雲、普門宗主、廣慧妙弁<sup>6</sup>樹宗弘教大師印公碑銘。

榮祿大夫、大司徒、壽安山大昭孝弘聖寺住持、釋源宗主法洪撰。

\*本論文為2016年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項目批准號ZD201620）的階段性成果。

<sup>1</sup> 溫玉成：《五臺山與蒙元時代的佛教》，《五臺山研究》1987年第5期，頁9-10。

<sup>2</sup> 溫玉成：《五臺山佛教筭記》，《五臺山研究》1991年第3期，頁21-23。

<sup>3</sup> 杯茗：《南山寺碑文》，《五臺山研究》1997年第4期，頁36-37。

<sup>4</sup> 高明和：《南山寺印公碑並非元碑》，《五臺山研究》1995年第3期，頁39、48。

<sup>5</sup> 尚雨：《南山寺佛教史略》，《五臺山研究》1997年第4期，頁10-11。

<sup>6</sup> 溫玉成錄文為「辯」。

大承天護聖寺開演經律論三學法主法賢舊題書丹。<sup>7</sup>

直隸正定府正定縣恒山郡西北鄉居士、字晏候、官印自蹊拙筆抄錄新題書丹。<sup>8</sup>

慧印，張氏，陝西下□人，父光，母魏氏。公年八歲，從鄉先生張君讀孔氏書。依北禪永昌寺真慧大師<sup>9</sup>為僧，從草堂忠公、久道常公、月岩稱公學佛氏法。及東游，其兄可誠之曰：「珍寶之贖，孰與忠言。既為佛矣，當永其道。浮雲富貴，何足置懷。」公拜而別，乃由關陝逾河而東，從普救寺月公學圓覺了義。又逾河而南，從白馬寺大慧國師<sup>10</sup>育公學華嚴圓極之教。又從許州棲岩益公、洛陽意公學唯識等<sup>11</sup>論。鄢陵<sup>12</sup>之會，從五峰信公受芻芻戒<sup>13</sup>。時湍陽緣公為羯摩，益公為教授，定公、究公、慶公等為七證，皆一時望也<sup>14</sup>。二十有三，鄢陵再會，資受具足戒。二十有四，從<sup>15</sup>靈峰燦公之勸，嗣法於棲岩益公。因葛氏設百師會，升座說法，眾會鹹稱第一，遂知名於世。又從律師秀公受《四分律義》<sup>16</sup>。二十有五，從論師心崖和尚<sup>17</sup>學《因明》等論。景德<sup>?</sup>之會，僧錄穎公為壇主，緣公為羯摩，益公為教授，五峰信公為和尚，重資大戒。二十有八，從大通寺驗公學《華嚴大疏》。年三十，以僧錄穎公請<sup>18</sup>，講《唯識》等論。凡受請講說《華嚴》《圓覺》《楞嚴》等經、《因明》等論數十餘次，三受資戒，飯僧十余萬人。皇慶初，承太后旨至京師，于安國寺講《華嚴義疏》，又以詔於弘法寺<sup>19</sup>讎<sup>20</sup>校諸經、鈔疏。二年，於上都海寶寺講《華嚴玄談》及《甘露疏》。及還，于啟明堂講《圓覺》《彌勒上生》二經。其年冬，奉聖旨及太后命，遣殊祥院使執禮和台送至五臺山大萬聖佑國寺，為長講法主，賜以袈裟，衣服有差<sup>21</sup>。延佑元年，詔殊祥院使伯顏帖木兒<sup>22</sup>論<sup>23</sup>旨，住持此寺，講說秘奧，為國延厘<sup>24</sup>。六年夏，受秘密之法于帝師。

<sup>7</sup> 溫玉成未錄此句話。

<sup>8</sup> 溫玉成未錄此句話。

<sup>9</sup> 廣公真慧國師在元代重建大聖佑國寺、萬聖佑國寺等，為元大承天護聖寺住持、榮祿大夫、司徒，慧印法師跟隨他出家。

<sup>10</sup> 溫玉成錄文為「入白馬寺，從大慧國師」。

<sup>11</sup> 溫玉成未錄。

<sup>12</sup> 鄢陵，隸屬今許昌市，位於河南省中部，在伏牛山脈東，黃河南側。

<sup>13</sup> 溫玉成錄為「比丘戒」，芻戒，即比丘戒。

<sup>14</sup> 溫玉成錄為「皆一時之望也」。

<sup>15</sup> 溫玉成錄為「以」。

<sup>16</sup> 溫玉成錄為「四分律」。

<sup>17</sup> 溫玉成錄為「從論師心虛智公」。

<sup>18</sup> 溫玉成錄文「以僧錄頻公之請」。

<sup>19</sup> 溫玉成錄為「又詔於弘法寺」。

<sup>20</sup> 杯茗錄為「儲校」。

<sup>21</sup> 杯茗錄為「有加」。

<sup>22</sup> 溫玉成錄為「日顏帖木兒」。

<sup>23</sup> 溫玉成錄為「禦旨」。

<sup>24</sup> 溫玉成錄為「延釐」。

又從上士<sup>25</sup>僧吉學六支秘要。英宗皇帝幸臺山，從上曆諸寺，所至承顧問，訪以至道。至南臺上，以陰雲瞞晦翳<sup>26</sup>，不睹光瑞。命公于文殊像前，致上之誠祈焉。俄頃，睹慶雲流彩，<sup>27</sup>身光煥景。文殊之像，依稀如在明鏡之中，<sup>28</sup>詔公記于石。又諭旨：凡此山之寺<sup>29</sup>，皆統於公，賜幣萬五千緡<sup>30</sup>，文殊像一，七寶、數珠、束帛有加。<sup>31</sup>又以詔乘驛至京師，與諸德於大永福寺讎校藏經<sup>32</sup>。三年夏，上遣宗室益不花太子奉禦旨至五台，設華嚴會，賜公手詔，代上行香，加賜禦酒<sup>33</sup>。其為眷遇如此。歲乙丑，帝師至此山，施以衣帽、鈔幣、白金五十兩。歲丙寅，又從上士管加受時輪<sup>34</sup>六支秘要之法。文宗登極<sup>35</sup>，詔遣禧院官乘驛致京師，住持大承天護聖寺，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銀印一品，加賜金帛。上幸承天禦仁壽殿，旨公曰：「而今而後，或有教門之事，汝可面奏。」公以嗣法於棲岩，承教於真慧，其道蓋得之於孝岩之派<sup>36</sup>多和之師、益公之師也。三老皆望高於世，未有封號。因御史大夫撒迪公請於上<sup>37</sup>，詔賜溫公號曰多和國師<sup>38</sup>、益公曰棲岩國師、廣公<sup>39</sup>曰真慧國師。公為人明敏好學，年二十餘，已有盛名于時。公以其道見知於上，所得賜與之物，於臺山創寺曰普門，大都創寺曰寶雲。至元三年丁醜五月二十三日癸亥歿，年六十七，門弟子二百余人，智安、了資、道佑、法賢、法量等首焉。火化，斂遺骨，建塔於西山之下。既葬，其徒狀公出處之跡，謁銘于石。且佛氏之教，經莫大于《華嚴》，論莫奧於《唯識》，律莫詳於大《四分》，至於百法，窮法相之本，因明著立破之規，此而通則三藏殊，文思過半矣。公之於佛，以學以行，可謂博文綯禮者。夫紀之貞石，著之僧史，因無醜也。銘曰：

惟古明哲，遺世如屣。其訖於佛，必也有以。  
 惟佛之大，其道孰此。遺言范世，百王是軌。  
 唯識唯心，萬物終始。關鍵幽秘，非知莫啟。

<sup>25</sup> 上士，指藏傳佛教的上師。

<sup>26</sup> 杯茗錄為「瞞翳」。

<sup>27</sup> 溫玉成錄為「□睹慶雲□□」。

<sup>28</sup> 溫玉成錄為「依稀如前，在明鏡之中」。

<sup>29</sup> 溫玉成錄為「僧」。

<sup>30</sup> 杯茗錄為「五萬千緡」。

<sup>31</sup> 杯茗錄為「七寶數珠一束，帛有加」，溫玉成錄為「束帛有加」。

<sup>32</sup> 杯茗錄為「儲校藏經」。

<sup>33</sup> 溫玉成錄為「加賜禦酒東台」。

<sup>34</sup> 杯茗錄為「時論」。

<sup>35</sup> 溫玉成錄為「文宗極詔」。

<sup>36</sup> 杯茗錄為「棲嚴之派」。

<sup>37</sup> 溫玉成錄為「以請於上」。

<sup>38</sup> 溫玉成錄為「老師」。

<sup>39</sup> 廣公在《少林禪師裕公碑》（《嵩山少林寺輯志》卷21）記載「（裕公）當為大器，即為祝發，授具，與雙溪廣公同執事者七年，游方來燕，親炙萬松師又十年，道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其住少林也」。

惟公之明，爰究茲理。揚淺屬深，遂窮淵底。  
 殷也超拔，遁也疊疊。聽公瓴建，鮮不旗靡。  
 匪義弗由，惟道之履。厥聲孔嘉，升聞宸衷。  
 天龍薦及，如公其機。十科紀德，煥乎僧史。  
 彼雖逢時，何足與此。有塔于林，西山之趾。  
 葉落歸根，公其已矣。莫往莫來，孰生孰死。  
 死而不亡，遺芳何已。<sup>40</sup>

大元至元五年乙卯八月吉日

大萬聖佑國寺住持智安等立石



五臺山寺院圖

## (二) 慧印出家與三次受戒

「印公碑」記載了慧印（1271-1337）一生修學和弘揚佛法的事蹟，他生於至元八年（1271），經歷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明宗、甯宗和順帝時期，圓寂於後至元三年（1337），壽 67 歲。可見，慧印從出家學佛到弘法利生活動與元相始終，他的活動也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元代佛教的興盛和皇室對於佛教的支持。縱觀慧印一生，可以元大德四年（1300），即印公 30 歲為界，之前，印公各地拜師修學佛法和三度受戒的活動；之後他在五臺山和兩都講經校經和建寺弘法的活動。

<sup>40</sup> 從「門弟子二百余人」後至「遺芳何已」，溫玉成未錄。

## 1、印公出家與拜師學法

印公，俗姓張，諱慧印，陝西人，從 8 歲開始跟隨鄉村先生學習儒家經典，不久出家，學習佛法。「印公碑」記載：「慧印，張氏，陝西下口人，父光，母魏氏。公年八歲，從鄉先生張君讀孔氏書。依北禪永昌寺真慧大師為僧，從草堂忠公、久道常公、月岩稱公學佛氏法。」《弘教大師傳》也載：「元弘教，諱慧印，關西張氏子，少攻儒典，長業佛書。」<sup>41</sup>

印公，法號慧印，陝西關西人，有「弘教大師」之號。8 歲以後，他跟隨北禪永昌寺真慧大師出家開始學習佛法，到 30 歲時開始講經說法。根據「印公碑」記載，在慧印法師學習期間，慧印法師與近 20 位高僧有過聯繫，即永昌寺真慧大師、草堂忠公、久道常公、月岩稱公、普救寺月公、白馬寺大慧國師育公、許州棲岩益公、洛陽意公、五峰信公受、湍陽緣公、定公、究公、慶公、靈峰燦公、律師秀公、論師心崖和尚、僧錄穎公、大通寺驗公等。慧印或隨他們學習佛教義理和律典，或由他們剃度受戒。

在關陝家鄉時，慧印法師最初跟隨北禪永昌寺真慧大師法學習佛法，及長，他開始離開家鄉東游拜師進一步修學佛法。「印公碑」記載：「（印公）及東遊……乃由關陝逾河而東，從普救寺月公學圓覺了義。又逾河而南，從白馬寺大慧國師育公學《華嚴》圓極之教。又從許州棲岩益公、洛陽意公學唯識等論。」

《補續高僧傳》也有類似記載：「慧印，關西張氏子，自幼信佛乘出家。後從河東普救月公，學《圓覺了義》。又從河南白馬寺大慧國師，學《華嚴》圓極之教。後學《唯識論》於棲岩益公。」<sup>42</sup>

《弘教大師傳》也載：「始逾河東，從普救月公學《圓覺了義》。又逾河而南，從白馬寺大慧國師，學《華嚴》圓極之教。復從棲岩益公，學《唯識》等論。」<sup>4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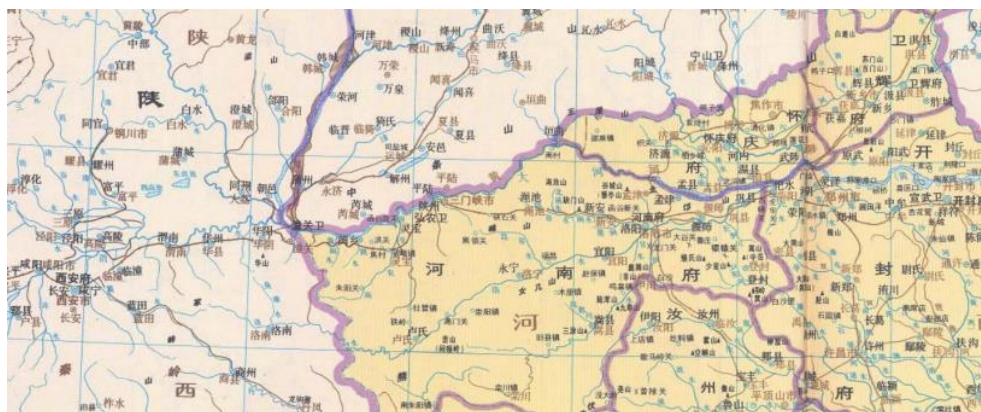
據此記載可知，元代時期，河南、山西等地佛教界華嚴學和唯識思想還是比較流行的，這也是會印東來學習佛法的主要原因。慧印從關陝地區向東過黃河，首先來至平陽路一帶的普救寺。普救寺始建于唐武則天時期，原名永清院。慧印隨普救寺的月公法師學習《圓覺了義經》，即《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sup>44</sup>。

<sup>41</sup> 《清涼山志》卷 3，《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 79，號 81，頁 136 上欄 9。

<sup>42</sup> （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 4，《卍新續藏》冊 77，號 1524，頁 390 中欄 07。

<sup>43</sup> 《清涼山志》卷 3，頁 136 上欄 9。

<sup>44</sup> 唐北印度罽賓人佛陀多羅在東都白馬寺翻譯完成。圓覺了義之圓以圓融有漏為義，覺以覺盡無餘為義。



慧印法師先在普救寺隨月公學習《圓覺》之後，再次渡黃河來至洛陽白馬寺，跟隨大慧國師育公學習《華嚴經》等。育公，即洛陽白馬寺行育，《龍川和尚遺囑記》、《龍川和尚塔志》、《大元重修釋源大白馬寺賜田功德之碑》、《故釋源宗主宗密圓融大師塔銘》、《扶宗弘教大師奉詔修白馬寺紀實》<sup>45</sup>和《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收錄的《清涼國師妙覺塔記》<sup>46</sup>對行育都有一定記載。

行育大師（?-1293），名龍川，亦稱行吉祥，姓納合氏，為金朝遺僧，女真人，華嚴傳人，「得度于寶應秀，受業于永安柔」，隨善柔學習華嚴奧旨，其佛事活動主要集中在忽必烈時期，弘法範圍涉及燕京（大都）、洛陽、隴右、奉聖州、長安、揚州等。行育有大慧國師、宗弘教大師封號，贈司空、鴻臚卿，還有護法大師之諡號。龍川大師既參與佛道論戰、在奉聖州傳戒律、參與編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負責江淮諸路佛教事務，促成《普甯藏》的刊印，又出任白馬寺釋源宗主，負責重建白馬寺，並發願重建華嚴四祖舍利塔等，傳承法脈。龍川大師的弘法活動促進了蒙古、元時期中原佛教與西北佛教、中原佛教與南方佛教融合與發展，對推動元代華嚴宗傳承和佛經流布起了積極作用。<sup>47</sup>

<sup>45</sup> 《龍川和尚塔志》，洛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洛陽市志》卷 15，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68、99-100、69、100-101、67。

<sup>46</sup>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崔紅芬《元代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考略》，2017 年 4 月臺北華嚴連社會議提交論文）內容有「大元華嚴寺重修大唐華嚴新舊兩經疏主翻經大教授充上都僧緣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宣賜京兆府長春禪庵長講沙門印吉祥集……至元九年歲次壬申九月日 宣賜扶宗弘教大師上穀大法雲寺傳戒長講沙門行吉祥建」的記載，龍川行育作為華嚴傳人，在至元九年（1272）帶領眾弟子到長安祭拜華嚴四祖澄觀，見塔廢碑亡，請奏帝師巴思八之後，重新修建澄觀塔。塔記的集撰者是「宣賜京兆府長春禪庵長講沙門印吉祥」，那麼「印吉祥」和「印公碑」之慧印雖然都與龍川行育有關，但二者是否同一人呢？印公碑之印公，法名慧印，是名字第二個字「印」加公字，表示尊稱，他生於至元八年（1271）卒於後至元三年（1337），在他兩歲時，龍川行育大師重建澄觀舍利塔，印吉祥撰塔記，可以確定印公和印吉祥非同一人。根據龍川行育又稱行吉祥，是法名第一個字「行」加吉祥，那麼印吉祥也是第一個字為「印」加吉祥，而印公之「印」是第二字，在次證明印公碑之慧印與印吉祥非同一人。

<sup>47</sup> 崔紅芬：《龍川行育大師在元弘法活動考》（待刊）。

在學習《圓覺了義經》和《華嚴經》之後，慧印又隨棲岩益公學《唯識》等論。棲岩益公，俗姓劉，鄭州人，齠齔之齡出家，19歲正式成為僧人，15、16歲時在京城寶集寺學習佛法，後又學《華嚴》《唯識》，並精於戒律，後在許州大洪濟寺講《唯識》40多年，並取得很好的成績。《補續高僧傳》對棲岩益公有載：

棲岩益和尚，鄭州劉氏子也。方在娠，其母夢，適野而得金印。野有人曰：「亟以獻佛無留也，即望見塔廟甚盛。」因懷印以往，既寤而師生，父母異之。甫齔俾出，依鎮陽天寧肫公。父母南歸，以幼復攜從焉。十五六衣衲<sup>48</sup>，北征學于燕中寶集寺，又學《華嚴》圓頓教於真定淨公，學《唯識》于大樑孝嚴溫公。歲月逾滋，心義洞了，溫每豎義，鳴鼓升堂，義鋒四起。師惟豎一指，當其所至，霧解冰銷，莫不捲舌低眉，以就聽位。尋退，修壁觀于明月山。大比丘全公輩，謂今塵刹俱空，法無所住，燈昏夜永。孰測迷津，乃共即山中，請師出世。師感受其言，出居許州大洪濟寺，開《唯識》宗旨。購疏記三十餘部，凡一千三百余卷，師以次數宣義，聲振遠近，傾耳位下者，恒千餘人。自河以南，願學者皆趨焉，其始至也，殘屋與僧，各不四五。既而敝者新，無者有，莊嚴殊甚，如天宮殿。信度檀田，出入衍溢，皆師德化所致。師戒律精嚴，終身壞衣粗食，然四指以煉心，講《唯識》四十餘年，凡三十余周。河洛之間，設席以待者，遑遑如不及。上之王公貴人，下之樵兒牧叟，無不敬禮信向。四方欲究窮了義者，皆以師為歸。亦孰知師所謂了義者，不徒在言說間也。賜號佛性圓明普照大師，以延佑二年四月示寂，年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五，全身塔于城南。<sup>49</sup>

可見，慧印法師22歲之前，也就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之前已經學習《圓覺了義》《華嚴》和《唯識》等。慧印法師受具足戒之後，正式嗣法棲岩益公，並又隨其他法師學習佛法和律典，不斷提升佛學修養。「印公碑」記載：「二十有四，從靈峰燦公之勸，嗣法於棲岩益公。因葛氏設百師會，升座說法，眾會鹹稱第一，遂知名於世。又從律師秀公受《四分律義》，二十有五，從論師心崖和尚學《因明》等論……二十有八，從大通寺驗公學《華嚴大疏》。」

《弘教大師傳》也載：「二十四，以靈峰燦公之勸，嗣法於棲岩。是歲，葛氏設百僧會，請印充第一座說法，遂知名於世。又從律師秀公，講《四分律》。二十五，從心崖和公，學因明等論。二十八，從大通驗公，講《華嚴大疏》。」<sup>50</sup>

<sup>48</sup> 衣衲，衣襟，指僧人衣服。

<sup>49</sup>（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4，《卍新續藏》冊77，號1524，頁389上欄23。

<sup>50</sup>《清涼山志》卷3《弘教大師傳》，頁136上欄9。



慧印法師 25 歲，即成宗元貞元年（1295）以前，精通華嚴奧旨、唯識思想，並應邀在講經大會上講說佛經，得到與會大眾的稱讚，為此，慧印法師也小有名氣。之後，他又跟隨律師秀公學習律法，又隨心崖和公學習因明、隨大通驗公學習華嚴四祖澄觀的《華嚴大疏》<sup>51</sup>等。在 30 歲之前，慧印法師從陝西來至山西、河南等地修學佛法，精通圓覺了義、華嚴奧旨、律學和因明等思想，為他日後弘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 2、三次受戒，精通戒律

慧印法師除了律典的理論知識外，他在戒律方面也能夠身體力行，嚴於戒律。「印公碑」對於慧印受戒的記載最為詳細，先後三次受戒，即 22 歲受比丘戒、23 歲受具足戒、27 歲時重受資大戒。

「印公碑」記載：「鄆陵之會，從五峰信公受芻戒。時湍陽緣公為羯摩，益公為教授，定公、究公、慶公等為七證，皆一時望也。二十有三，鄆陵再會，資受具足戒，……二十有五，……景德？之會，僧錄穎公為壇主，緣公為羯摩，益公為教授，五峰信公為和尚，重資大戒。」而《弘教大師傳》僅載：「二十二歲，從五峰信公，受苾芻大戒于鄆陵。」<sup>52</sup>《慧印傳》也載：「二十二受大戒。」<sup>53</sup>

不同史料對慧印受戒記載有所不同，「印公碑」突出了慧印法師三次受戒，且有較為嚴格的受戒儀式。慧印法師前兩次受戒的地點都在鄆陵，鄆陵在元代屬於汴梁路所領十七縣之一，「開封，下。倚郭。祥符，下，倚郭。中牟，下，原武，下。舊以此縣隸延州。元初隸開封府。後復為延州縣如舊。至元九年，州廢，復來屬。鄆陵，中。滎澤，下。舊隸鄭州至元二年來屬。封丘，中。金大定中，河水湮沒，遷治新城。元初新城又為河水所壞，乃因故城遺址稍加完葺，而遷治焉。扶溝，下。陽武，下。舊隸延州。至元九年，州廢來屬。杞縣，中。元初河決，城之北面為水所圯，遂為大河之道。乃於故城北二裡河水北岸，築新城置縣。繼又修故城，號南杞縣。蓋黃河至此，分為三，其大河流於二城之間，其一流於新城之北郭睢河中，其一在故城之南，東流，俗稱三叉口。延津，下。舊為延州，隸河南路。至元九年，州廢，以縣來屬。蘭陽，下。通許，下。尉氏，下。太康，下。洧川，下。陳留，下。」<sup>54</sup>

慧印在鄆陵隨五峰信公受比丘戒。除五峰信公外，參加慧印受戒的僧人還有湍陽緣公作為羯摩師，許州棲岩益公為教授，定公、究公、慶公等為七證師。在

<sup>51</sup> 《華嚴大疏》為華嚴四祖澄觀所造，20 卷。

<sup>52</sup> 《清涼山志》卷 3《弘教大師傳》，頁 136 上欄 9。

<sup>53</sup> （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 4，頁 390 中欄 07。

<sup>54</sup>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59《地理志》（二），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401-1402。

景德？，參加慧印受戒的有僧錄穎公為壇主，緣公為羯摩，益公為教授，五峰信公為和尚等。「景德？」在哪裡，尚未有結果。考慮到羯摩師緣公，教授益公，和尚五峰信公等不僅在鄴陵參加慧印比丘戒受戒，而且還參加在景德？的受戒儀式。估計鄴陵和景德相距不是很遠。

慧印法師不僅精通佛教律典，而且還能夠嚴於踐行戒律的遵守。戒律是佛教的根本精神，《華嚴經》講道：「若信恭敬一切佛，則持淨戒順正教；若持淨戒順正教，諸佛賢聖所讚歎。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具足持淨戒，一切如來所讚歎。」<sup>55</sup>佛教的戒律是教人學佛所學，行佛所行，最後證得佛所證的廣大法門。

慧印法師生於元代至元八年（1272），卒於後至元三年（1337），從多位高僧修習佛法，在 30 歲之前學習華嚴、唯實、圓覺、因明和律典等，對於《華嚴》和《唯識》等思想有較好的掌握，並有一定聲望，後來在兩都、五臺山等地宣講佛經和繼續修習密乘，成為顯密兼修的高僧。

## 二、慧印五臺山弘法

五臺山是中國北方一座名山，又名為清涼山，是中國著名的佛教聖地，居四大名山之首。五臺山山勢險峻，層巒疊嶂，古木蒼翠，風光獨特，空氣清新，氣候清涼，有「清涼世界」的美譽。《清涼山志》卷一記載：「東震旦國清涼山者，乃曼殊大士之化宇也，亦名『五臺山』。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台，故曰『五台』。雄據雁代，盤礴數州。在四關之中，週五百餘裡。左鄰恒嶽，秀出千峰；右瞰滹沱，長流一帶。北陵紫塞，遏萬里之煙塵；南擁中原，為大國之遮罩。山之形勢，難以盡言。五峰中立，千嶂環開。曲屈窈窕，鎖千道之長溪；迭翠回嵐，幕百重之峻嶺。巋巍敦厚，他山莫比，故有大人狀焉。」<sup>56</sup>《清涼山志》卷二也載：「五台，亦曰五峰，台言高平，峰言聳峭。所以有五者，觀國師雲：『表我大聖，五智已圓，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秘，洞五陰之性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矣。』其東西南北四台，皆自中台發脈。一山連屬，勢若游龍。唯南台特秀而寫居焉。」<sup>57</sup>

五臺山氣候宜人，具有豐厚的佛教文化內涵，從唐代起五臺山成為僧眾巡禮朝拜和修學佛法的聖地。晚唐五代時敦煌僧人朝拜五臺山已成一種風氣，敦煌的

<sup>55</sup>（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號 278，頁 432 下欄 15。

<sup>56</sup>《清涼山志》卷 1《總標化宇》，頁 15 上欄 08。

<sup>57</sup>《清涼山志》卷 2《五峰靈跡》，頁 41 上欄 08。

五臺山信仰十分興盛，在敦煌文獻中保存有很多關於五臺山的文獻。由於文殊信仰流行，很多地方紛紛效仿五臺山在本地建立「文殊院」和「文殊堂」。

### （一）住大萬聖佑國寺

慧印法師從關陝東來，遊歷各地，拜師學法，20 多年間，他廣學各種法門，尤其精通華嚴、唯識等思想，然後他進入太行地區，弘法和修學禪法。「慧印傳」記載：「於二十年間，遊戲教海，無不叩之門，無不窮之理。出世獨為棲岩燒香，蓋以唯識為歸也。後入太行山，修唯心、識定七年，得根塵虛靜。」<sup>58</sup>

慧印法師 30 歲時，他厭倦各處遊歷，來至太行上，繼續修習「一相三昧」<sup>59</sup>禪法，深得佛法之根本奧旨。「弘教大師傳」也載：「三十，厭遊，盡屏所學，居太行之阿，修一相三昧。七年，方得根塵虛靜。」<sup>60</sup>慧印法師在五臺山講經說法，廣弘華嚴、唯識等。「印公碑」有載：「年三十，以僧錄穎公請，講《唯識》等論。凡受請講說《華嚴》《圓覺》《楞嚴》等經、《因明》等論數十餘次。」慧印法師在太行山的講經弘法活動使他聲聞大振，為他日後在大都等地弘法奠定了基礎。

皇慶二年（1313），慧印法師在大都弘法之後，因為佛教學識淵博，受朝廷統治者和僧眾的稱讚，於是奉仁宗聖旨和太后之命，被護送至五臺山，任大萬聖佑國寺長講法主，賜以袈裟。延祐元年（1314）慧印法師再奉詔出任五臺山大萬聖佑國寺住持，弘傳顯密奧法，為統治者祈福除災。「印公碑」有載：「其年（皇慶二年）冬，奉聖旨及太后命，遣殊祥院使執禮和台送至五臺山大萬聖佑國寺，為長講法主，賜以袈裟，衣服有差。延祐元年，詔殊祥院使伯顏帖木兒論旨，住持此寺，講說秘奧，為國延厘。」慧印法師奉聖旨，由正二品的殊祥院使護送至五臺山，可見朝廷對於慧印法師的欣賞和重視。

### （二）修學時輪密法

慧印法師不僅精通顯教經典，在五臺山時期還繼續修學密法，延祐六年（1319）受密法于帝師。帝師出現於西夏時期，在西夏，帝師基本由藏傳佛教僧人擔任，屬於噶舉派下屬分支噶瑪噶舉派、蔡巴噶舉或拔絨噶舉派。帝師是皇帝的精神導師，統領功德司，擔任功德司正之職，全面負責國家宗教事務。帝師既是宗教界的領袖，還擁有很高的世俗官銜，與中書、樞密等並列，相當於上等位。<sup>61</sup>元代繼承西夏的帝師制度，基本由薩迦派僧人擔任，巴思八作為元代第一位帝師，到仁

<sup>58</sup>（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 4，頁 390 中欄 07。

<sup>59</sup> 一相三昧，指禪定概念。《六祖壇經》講道：「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

<sup>60</sup>《清涼山志》卷 3《弘教大師傳》，頁 136 上欄 09。

<sup>61</sup> 崔紅芬：《再論西夏帝師》，《中國藏學》2008 年第 1 期，頁 210-214。

宗時期經歷多位帝師。《元史》記載：「庚子，詔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為帝師，賜玉印，仍詔天下。」<sup>62</sup>延祐二年（1315）二月，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為帝師。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帝師到西番為僧人受具足戒，《元史》載：「命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葛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千三百五十兩、銀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sup>63</sup>《元史》記載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卒於至治三年（1323）<sup>64</sup>，「亦憐真嗣為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刺乞列（刺吉塔）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刺斯八斡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真監藏嗣，又明年卒。都（相）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巴）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葛嗣，至治三年卒。」<sup>65</sup>

不論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是卒於至治三年（1323）還是卒於陰火兔年（1327）年，但是他在延祐六年（1319）曾去五臺山，慧印法師隨受密法。「印公碑」還載：「六年夏，受秘密之法于帝師。又從上士（師）僧吉學六支秘要……歲丙寅，又從上士（師）管加受時輪六支秘要之法。」《弘法大師傳》也有慧印在「至治元年，從帝師受秘密之訣」的記載。慧印隨帝師受密法的時間記載有一定差異，但受密法之事實應是存在的。

藏傳佛教強調皈依「師、佛、法、僧」，延祐六年（1319）慧印隨帝師受密法外，還從藏族僧人上士僧吉修學六支加持、祈禱密法。六支指收攝支、淨慮支、命勤支、執持支、隨念支、三摩地支，為時輪金剛<sup>66</sup>的圓滿次第六種修持密法。時輪金剛為密乘無上瑜伽部的本尊之一。丙寅歲即泰定三年（1326），藏族僧人上師管加受時輪六支秘要法門。

噶舉派的那饒巴的弟子中有兄弟四人，即旁塘巴、其哥哥法智、兩個弟弟（一個是時輪師，另一個是塘窮巴），《青史》記載：尼泊爾旁塘巴又叫阿塔巴欽波，兄長法智（Thamamati），弟弟時輪師及塘窮巴。兄弟四人中，法智（Thamamati）依止那饒巴十二年，旁塘巴前來迎請時，法智（Thamamati）說：「你在這裡住下

<sup>62</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5《仁宗本紀》（二），頁 568。

<sup>63</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7《英宗本紀》（一），頁 615。

<sup>64</sup> 有關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葛卒於哪年文獻記載不一，《薩迦世系史》（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00）記載他卒於二十九，即陰火兔年，也就是丁卯年（1327）。《紅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2）記載，他在普顏篤、格堅、也孫鐵木耳三位皇帝時任帝師，享年二十九歲，於陰火兔年（1327）二月逝於大都。

<sup>65</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02《釋老傳》，頁 4518-4519。

<sup>66</sup> 時輪金剛法是藏傳佛教金剛乘無上瑜珈法門中之大法，分「外、內、別」三類，其中「外」是指天文、星象數學。「內」是指人體的構造和經絡氣脈的運行。「別」是實際修持法，依本尊與他的圓形壇城而修。行者得到灌頂的加持後，可按部就班學習和修持所有時輪金剛法。

吧！我有我上師的授記，吩咐去五臺山，該入何處就入那裡。」旁塘巴依止那饒巴九年，聞習身古了、喜金剛等許多教法，尤其從勝樂門獲得中、低成就。弟弟時輪師在那饒巴座前依止五年，聽受了勝樂等許多教法。幼弟塘窮巴前來迎接時輪師，也從那饒巴受得灌頂和續部口訣教授。<sup>67</sup>塘窮巴終於成為學富五明的班智達，帶著弟子來過西藏，他的一個弟子智賢是位著名學者，曾于尼泊爾同一些外道僧、瑜伽女旃陀羅勒就佛法真偽辯論，獲得勝利，聲名遠揚。他在 12 世紀晚期來藏傳法，瑪爾巴多巴、歐譯師、瑪覺譯師和洛嘉譯師從其學習，仁布譯師紮覺喜饒盡受其傳。據藏文資料記載，他去過五臺山，擔任過西夏王的上師，創建了勝樂佛殿，最後病逝於西夏。<sup>68</sup>

可見，五臺山漢傳、藏傳佛教都十分興盛，元代時，藏傳佛教的時輪密法在五臺山非常流行，慧印法師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掌握了藏傳密法的理論和實踐修持，他已是為顯密兼修的高僧大德。

### （三）從事法事活動

五臺山作為佛教聖地，備受元代統治者的喜歡，不僅高僧大德常常遊歷學法，而且元代皇帝、太后、太子等常常巡幸五臺山禮佛，施捨錢財，作法事活動，祈求國泰民安。「印公碑」載：「英宗皇帝幸臺山，從上曆諸寺，所至承顧問，訪以至道。至南臺上，以陰雲瞞晦翳，不睹光瑞。命公于文殊像前，致上之誠祈焉。俄頃，睹慶雲流彩，身光煥景。文殊之像，依稀如在明鏡之中，詔公記于石。又諭旨：凡此山之寺，皆統於公，賜幣萬五千緡，文殊像一，七寶、數珠、束帛有加。」「印公碑」記載了元英宗曾去五臺山禮佛，但沒有提及時間，「慧印傳」則載：「至治二年，英宗遊台，拉師與俱至南頂。命師祈嘉瑞，師即禪定。帝，見白光如水，彌滿空際，大士禦圓相現光中。喜甚。」<sup>69</sup>《元史》也載：「（至治二年）六月丁卯朔，車駕至五臺山，禁扈從宿衛，毋踐民禾。」<sup>70</sup>可見，至治二年（1322）英宗皇帝來至五臺山巡禮遊歷拜佛，慧印法師陪護皇帝遊歷各個寺院，並給皇帝進行詳細介紹和解說，及至登上南台，因烏雲密布，不能很好欣賞美景和佛光瑞像，令慧印法師在文殊菩薩像面前禪定作法，代表皇上誠心祈願，頃刻間，雲開霧散，美景與瑞像一覽無餘，為此皇帝十分高興，對於慧印法師的法術和佛法更是讚歎。於是下令，將禪定作法之事刻石為記。同時，下令慧印法師統管五臺山所有寺院，並給以豐厚的賞賜。

<sup>67</sup> 參見廓諾·迅魯伯著，郭和卿譯：《青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3。

<sup>68</sup> 崔紅芬：《文化融合與延續：11-13世紀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與發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49頁。

<sup>69</sup> （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4，第390頁中欄07。

<sup>70</sup>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8《英宗本紀》（二），頁623。

至治三年（1323）夏四月，「夏四月壬戌朔，敕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敕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台萬聖祐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丁亥，故羅羅斯宣慰使述古妻漂末權領司事，遣其子娑住邦來獻方物。」<sup>71</sup>《元史》的記載比較籠統，至治三年的佛事活動範圍較大，同時在京師、揚子、五臺山等多地舉辦佛事活動。其中五臺山的法事活動在萬聖祐國寺舉行，太子益不花奉旨親臨五臺山參與佛事活動，萬聖祐國寺的住持慧印法師具體負責，代皇帝行香祈福。「印公碑」也有相應記載：「三年夏，上遣宗室益不花太子奉禦旨至五台，設華嚴會，賜公手詔，代上行香，加賜禦酒，其為眷遇如此。」

慧印法師作為華嚴高僧，精通華嚴思想，由他主持華嚴會比較合適。至治三年（1323）多地舉行的法會祈福攘災活動，與當時各地饑荒和動亂有一定關係。《元史》載：「（至治三年三月）丁酉，平江路嘉定州饑，發粟六萬石賑之。戊戌，安豐芍陂屯田女直戶饑，賑糧一月。庚子，崇明諸州饑，發米萬八千三百石賑之。甲辰，台州路黃岩州饑，賑糧兩月。丁未，西番參卜郎諸族叛，敕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發兵討之。……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道度牒、符錄。」

72

乙丑歲即泰定二年（1325）時，帝師來至五臺山，給慧印法師等施以衣帽、鈔幣、白金五十兩等。此處的帝師是哪一位呢？若按《元史》記載，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蔔在至治三年（1323）<sup>73</sup>卒，那就不是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蔔，而是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蔔。若按《薩迦世系史》《紅史》記載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卒於陰火兔年（1327），那去五臺山的帝師則是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蔔。《元史》記載：「（延祐）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蔔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蔔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真吃刺失思嗣。」<sup>74</sup>《元史》還載：「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sup>75</sup>

無論如何，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一點，慧印法師是為顯密兼修的高僧，在元仁宗、英宗和泰定帝時在五臺山住持萬聖祐國寺，受到皇室的尊崇。他一方面弘傳佛法，另一方面為朝廷主持法事活動，為皇室、王公貴族和民眾祈福，希望國祚長久。

<sup>71</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8《英宗本紀》（二），頁630。

<sup>72</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8《英宗本紀》（二），頁629。

<sup>73</sup> 陳慶英等認為，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蔔卒於至治三年（1323）有誤，應是卒於陰火兔年（1327）（參見陳慶英、仁慶紮西《元朝帝師制度述略》，《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

<sup>74</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02《釋老傳》，頁4519。

<sup>75</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02《釋老傳》，頁4521。

### 三、慧印在兩都弘法

憲宗元年（1251）蒙哥即汗位後，命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從漠北哈拉和林南下駐帳金蓮川，征天下名士，建立著名的金蓮川幕府。金蓮川幕府的建立，對忽必烈治理漢地乃至統一全中國起了重要的作用。憲宗八年（1256），忽必烈命劉秉忠在金蓮川一帶選址建城，初名為開平府。憲宗九年（1259）城郭建成，同年蒙哥率軍攻四川時，染病死於軍中。中統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繼汗於開平，仿漢制建元中統，為元開國皇帝元世祖，世祖將開平府作為第一個都城。中統元年（1264）五月，世祖又建大都（今北京），詔開平府升為上都，以取代漠北哈拉和林的地位，改燕京為中都，後又稱大都。從此以上都定為夏都，與大都共同構成了元朝的兩大首都，確立了兩都巡幸制度。每年四月，元朝皇帝便來上都，九月秋涼返回大都，皇帝在上都的時間長達半年之久。皇帝去上都時，政府諸司都分司相從，以處理重要政務。除此之外，皇帝要狩獵行樂，還要舉行蒙古諸王貴族的朝會和傳統的祭祀活動，聯絡與蒙古諸王的情感。

#### （一）兩都講經說法

慧印法師的兩都弘法活動，就是指他在大都和上都的弘法，實際上，只在皇慶二年（1313）從大都來至上都海寶寺，為僧眾和信徒講說《華嚴玄談》和《甘露疏》，弘傳華嚴思想和淨土思想。慧印法師弘法活動主要集中在大都。

從皇慶初年（1312）到後至元三年（1337）間，慧印法師三次從五臺山到大都或弘法，或住持寺院。慧印法師第一次到大都弘法是在元仁宗時期，奉太后旨到大都講解佛經、在弘法寺校勘諸經疏。第二次是在元英宗時期又奉詔在大永福寺校勘佛經。第三次是在元文宗時期，奉旨住大承天護聖寺。

慧印法師到大都弘法，首先是在安國寺講經說法，「印公碑」記載：「皇慶初，承太后旨至京師，于安國寺講《華嚴義疏》……二年，於上都海寶寺講《華嚴玄談》及《甘露疏》。及還，于啟明堂講《圓覺》《彌勒上生》二經。」《弘法大師傳》也載：「皇慶元年，聲聞遠播，承詔至京，于安國寺講經，王公縉素，罔不服化。」<sup>76</sup>安國寺在《金史》有載：「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褚）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sup>77</sup>

<sup>76</sup> 《清涼山志》卷3《弘教大師傳》，頁136上欄9。

<sup>77</sup> （元）脫脫等撰：《金史》卷127《隱逸·褚成亮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年，頁2748。

皇慶年是元仁宗年號，共兩年（1312-1313），仁宗是聖文欽孝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的次子，武宗的弟弟，其母為興聖太后，弘吉刺氏。據《元史·後妃列傳》記載：

成宗多疾，（卜魯罕）後居中用事，信任相哈刺哈孫，大德之政，人稱平允，皆後處決。京師創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後以手帕蒙覆其面，尋傳旨毀之。省院台臣奏上尊號，帝不允。車駕幸上都，後方自奏請。帝曰：「我病日久，國家大事多廢不舉，尚寧理此等事耶！」事遂寢。大德十年，後嘗謀貶順宗妃答吉與其子仁宗往懷州。明年，成宗崩。時武宗在北邊，恐其歸，必報前怨。後乃命取安西王阿難答失裡來京師，謀立之。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既誅安西王，並構後以私通事，出居東安州。<sup>78</sup>

仁宗母名答吉，後來尊為興聖太后。成宗時因多病，朝政由皇后不魯罕和權臣掌控，仁宗和其母遭到貶，來至懷州。成宗薨，發生了爭奪皇位的鬥爭，興聖皇后和兩子（武宗、仁宗）打敗以不魯罕皇后支持的阿難答。武宗海山繼皇帝位追尊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並詔立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受金寶。武宗、仁宗時期繼續支持佛教，《元史》有諸多記載不便一一列出，其中與太后、太子有關的內容為：「甲寅，敕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為三宮祈福。」<sup>79</sup>「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萬七百錠有奇。」<sup>80</sup>「甲辰，賜國王和童金二百五十兩、銀七百五十兩。立皇太子衛率府。發軍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己未，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署，秩五品。」<sup>81</sup>「癸未，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sup>82</sup>

由於統治者尊崇佛教，或在五臺山等地修建寺院，或皇室多次巡幸五臺山禮佛，大都與五臺山之間交往密切，皇室對於五臺山的佛教活動和高僧大德還是比較清楚的。及至仁宗繼位，皇太后下懿旨，詔請至大都安國寺講《華嚴義疏》《圓覺》和《彌勒上生》，這與當時華嚴信仰和彌勒淨土信仰有一定聯繫，也證明慧印在華嚴方面的成就。慧印大都的講經受到王公貴族和縑素之人的讚歎，為此慧印的聲譽也不斷提高。

<sup>78</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14《後妃列傳》（一），頁 2873-2874。

<sup>79</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本紀》（一），頁 482。

<sup>80</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本紀》（一），頁 488。

<sup>81</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本紀》（一），頁 496。

<sup>82</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本紀》（一），頁 505。



## （二）兩次校勘經藏

在大都期間，慧印法師還先後兩次校勘佛經、經疏，第一次在弘法寺，時間是仁宗皇慶元年（1312）；第二次在大永福寺，時間在英宗至治二年（1322），英宗巡幸五臺山結束後，因慧印突出的表現，皇帝非常滿意，令慧印隨他回到大都，為太子等受戒，賜司徒一品。慧印法師兩次到大都校勘佛經時間相差 10 年左右。

「印公碑」記載：「皇慶初，承太后旨至京師，……又以詔於弘法寺讎校諸經、鈔疏。……又以詔乘驛至京師，與諸德於大永福寺讎校藏經。」「弘教大師傳」記載：「詔陪駕至京師，於永福寺校正藏典，令太子貴人從師受菩薩戒。事訖還山。」<sup>83</sup>

弘法寺，也稱宏法寺，據熊夢祥的《析津志輯佚》記載：「弘法寺在舊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之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三年，賜紫衣弘教大師。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颯記，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篆額。盡此剎元時尚有，廢於明代（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五十五存疑引析津志。）」

慧印法師在大都弘法寺參與校勘經疏的應在仁宗時期。可見，元仁宗時期，再次對弘法寺藏經進行校勘和補訂。但慧印法師在大都弘法寺校勘經藏之事實《元史》中卻沒有記載，根據遺存的文獻和題記，我們知道元代多次刊印藏經。

其一，《普甯藏》刊印始於至元十四年（1277），終於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大德二年（1298）至元統三年（1335）間，還陸續有過四次大規模的刊板活動，即大德二年（1298）重刊《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至大三年（1310）和皇慶二年（1313）將沙羅巴譯經及《白雲和尚初學記》等續刊入藏，共 7 部 8 卷經籍，合成 6 冊；延祐四年（1317）至泰定元年（1324）將振、纓、世三字函《景德傳燈錄》三十卷補刻入藏；元統三年（1335）又將《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續刊入藏。<sup>84</sup>

其二，《磧砂藏》的刊印始於南宋嘉定九年（1216），期間朝代更迭而中斷，元貞二年（1296）恢復刊印，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全部刊畢。

其三，元仁宗延祐年間（1314-1320），陳覺琳募緣再次刊刻《毗盧藏》。據《影印宋磧砂藏經》所收福建鼓山湧泉寺藏本及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可知這次再雕《毗盧藏》，旨在重刊《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大部經。<sup>85</sup>

<sup>83</sup> 《清涼山志》卷 3《弘教大師傳》，頁 136 上欄 9。

<sup>84</sup> 參見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324-326。

<sup>85</sup> 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354。

其四，元官刻《大藏經》，暫定為元代官刻《弘法藏》<sup>86</sup>，可能始於至元年間，完成于皇慶二年（1313）四月以前雕版完成，在武昌雕刻，然後運至京師的，具體情況不詳。

其五，管主巴在大德年間（1297-1307）負責在杭州、平江地區先後刊刻河西字《大藏經》、藏文經典及單部經典。

慧印大師在大都弘法寺參與校勘經疏的活動屬於官方行為，從時間判斷，慧印法師參與《普甯藏》的續補、《磧砂藏》元代刊印、官版《弘法藏》補雕及管主巴印經等活動。但結合經藏雕刻地點和官方行為等，慧印法師主要參與官版《弘法藏》補雕及管主巴印經等。

《金史紀事本末》之《世宗致治》也載：「《金國文具錄》，秘書省，今在燕宏法寺。《析津志》雲，宏法寺在舊城。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三年，賜紫衣宏教大師。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胤記，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撰額。蓋此剎元時尚存，至明始廢。姑錄于此，以存金石之遺。」<sup>87</sup>

崔法珍刻經板運到金城後，藏於弘法寺，在金代曾對弘法寺本有所補刊，時間是在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文最》收錄的《濟州普照禪寺照公禪師塔銘》記載：「聞京師宏法寺有藏教板。吾當往彼印造之，即日啟行，遂至其寺，凡用錢二百萬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歸，一寶輪藏，黃卷赤軸□□□□□□，殿中安置，壁藏皆□梵冊，漆板，金字，以為嚴飾，庶幾清眾，易於翻閱……」<sup>88</sup>

可見，弘法寺的校勘經疏活動很大程度與《趙城金藏》有關。到了元代，因為戰爭和歷史久遠等因素，弘法寺版藏經再度遭到損毀，蒙元時期再次對弘法寺經藏進行補刊。忽必烈時期曾對弘法寺的經板進行補充和雕刻。《佛祖歷代通載》記載：「弘法寺藏經板歷年久遠，（世祖）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鼎新嚴飾，補足以傳無窮……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標芳號，遍佈天下。帝一統天下，外邦他國皆歸至化，帝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賜，皆令得瞻佛日。」<sup>89</sup>

忽必烈詔令高僧大德校正補刊弘法寺經板，同時也校勘編訂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時間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地方在大都興教寺。釋克己序文載：

<sup>86</sup> 童瑋、方廣錫等：《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現》，《文物》1984年第12期，頁82。

<sup>87</sup> （清）李有堂撰：《金史紀事本末》卷30，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0年，頁498。

<sup>88</sup> （清）張金吾編纂：《金文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592。

<sup>89</sup>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22引《弘教集》，《大正藏》，卷49，號2036，頁724中欄。

「惟我世祖薛禪皇帝，智極萬善，道冠百王。皎慧日以鏡空，扇慈風而被物。特旨宣諭臣佐，大集帝師、總統、名行師德，命三藏義學沙門慶吉祥，以蕃漢本參對，楷定大藏聖教，名之曰《至元法寶勘同總錄》。」<sup>90</sup>

元仁宗時期，詔令慧印校勘佛經疏與管主巴雕印藏經和官方續補《弘法藏》有密切關係。

影印本《磧沙藏》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卷末載：「上師三寶教持之德，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沙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伯錠及募緣刊雕，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再發心於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余卷，施財三伯錠，仍募緣于杭州路刊雕完備，續補天下藏經，悉令圓滿。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人夫。回向西方導師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海眾菩薩。祝延皇帝萬歲，太子、諸王福壽千春，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sup>91</sup>

管主巴大師精通漢文、西夏文和藏文，具有密宗身份，他先任松江府僧錄，有「廣福大師」之賜號，發心主持刊印和續補大量漢文本、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經、藏文經咒和參與《磧砂藏》密教部分的刊印等。大德十年（1306）左右又調任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局主緣，他負責、募緣雕刻《磧砂藏》，將從大都弘法寺取出南方大藏經中所缺失的佛經，重新刊板，在杭州路立局刊雕了二十八函秘密經典。可見，在管主八刊板的二十八函秘密經中，有些經典是弘法寺大藏經沒有收錄，且他們皆為本土僧人撰寫集錄的。管主巴將弘法寺的藏經補充南方藏經中所缺少的經典，並重新雕板，準備刊印。實際上，在補充其他藏經之前，應該要對作為底本的經典進行校勘是必要的。

另外，元英宗時期，曾打算刻印銅板藏經，《法禎傳》記載：「初皇慶之開舉場也。蒙古、色目習三場舉業，漸染朱熹之說，謂佛語為誕妄，詔翰林虎承旨、妙三藏與師三人，以張天覺護法論，譯為國語，以化之。英宗即位，將以大藏經治銅為板，而文多舛誤，征選天下名僧六十員讎較。師與湛堂、西谷三人為總督，重勘諸師所較，仍新為目錄，旌賞特加。泰定、至順之交，教門有大故。師必預議秉筆。後至元丙子。被兩宮詔旨。主南城大竹林。至正戊子。詔重譯菩提行頌文。陛見於大口行宮。上以漢語。呼師號而面諭焉。」<sup>92</sup>英宗即位之後，準備治

<sup>90</sup> 《至元法寶勘同總目錄》第二冊，釋克己序，頁 179。

<sup>91</sup> 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291。

<sup>92</sup> （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 1，頁 372 上欄 01。

銅板藏經，因為經文錯誤較多，在天下征選精通佛學的高僧進行校勘，慧印法師也在征選之列，來至大都校勘佛經。

《性澄傳》還載：「釋性澄，字湛堂，號越溪，會稽孫氏子也，父滿，母薑氏……至治辛酉驛召入京，問道於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無量壽佛等經各若干卷。」<sup>93</sup>性澄作為元代高僧，在至治辛酉年（1321）被詔入大都，居住在清塔寺校正大藏經。清塔寺即青塔寺，也就大永福寺，延祐元年（1314）敕建大永福寺。延祐五年（1318）置大永福寺總管府，秩三品。十一月又敕令大永福寺殿堂，安奉順宗皇帝的禦容，到英宗至治元年（1321）二月，「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幣帛萬匹。」<sup>94</sup>由於諸多記載，可以確定慧印法師參與《磧砂藏》密教部分的校勘和英宗時期銅板大藏經的校勘等工作。

### （三）住大承天護聖寺與建寺

慧印法師第三次來至大都是住持大承天護聖寺。大承天護聖寺是文宗天曆二年（1329）「以儲慶司所貯金三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護聖寺……甲寅，置隆祥總管府，秩正三品，總建大承天護聖寺工役……九月乙卯朔，作佛事於大明殿、興聖、隆福諸宮。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為大承天護聖寺永業。」<sup>95</sup>大承天護聖寺在元代是作為官寺，統治者投入很大的財力和物力，皇后施錢助修寺院，還有諸多賜田為寺院的永業田和常住，皇帝也常常巡幸寺院，可見寺院地位極高。《元史》還載：「十一月乙卯，以立皇后，詔天下。……皇后以銀五萬兩，助建大承天護聖寺。……以陝西饑，敕有司作佛事七日。壬辰，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為永業。……壬寅，括益都、般陽、寧海閒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為永業。」<sup>96</sup>慧印法師被文宗皇帝詔住持大承天護聖寺，可見朝廷對其重視。「印公碑」記載：「文宗登極，詔遣禧院官乘驛致京師，住持大承天護聖寺，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銀印一品，加賜金帛。上幸承天禦仁壽殿，旨公曰：『而今而後，或有教門之事，汝可面奏。』」

文宗皇帝先後兩次即位，兩個年號即天曆年（1328-1329）和至順年（1329-1330）。慧印法師在文宗即位之初出任大承天護聖寺的住持應指天曆年間。

慧印法師在住持和修建大承天護聖寺的同時，還將他多年來得到的賜予的財物用於五臺山普門寺和大都寶雲寺，以紀念多年來慧印法師在五臺山和大都的弘

<sup>93</sup>（明）如惺撰：《明高僧傳》卷1，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頁16。

<sup>94</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7《英宗本紀》（一），頁610。

<sup>95</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33《文宗本紀》（二），頁734、740。

<sup>96</sup>（明）宋濂等撰：《元史》卷33《文宗本紀》（二），頁744、756。

法活動，並滿足弘法利生的弘願。「印公碑」記載：「公以其道見知於上，所得賜與之物，於臺山創寺曰普門，大都創寺曰寶雲。」《清涼山志》記載：「至治二年，帝幸臺山見文殊化身，晃若臨鏡。至王子寺，有感，勅重修葺。是年，復建普門寺。」<sup>97</sup>

由於慧印法師廣博的佛學修養和嚴於戒律的品德而受到朝廷較高禮遇和特權，除了授予榮祿大夫、大司徒，給予銀印一品，加賜金帛外，還允許慧印法師直接面奏聖上，請奏佛教方面的事務。慧印法師雖然顯赫一時，地位尊崇，但他沒有忘記其學法的師父，向皇帝請奏，給出家師真慧、嗣法師益公和孝岩溫公等高僧以尊號。其中溫公應是益公等學法師，《棲岩益和尚傳》記載：「（益公）北征學于燕中寶集寺，又學華嚴圓頓教於真定淨公，學唯識于大樑孝嚴溫公。歲月逾滋，心義洞了。溫每豎義，鳴鼓升堂，義鋒四起，師惟豎一指。」<sup>98</sup>《光教律師法聞傳》也載：「法聞，陝西嚴氏子，楚莊王之裔，以諡為姓，避漢諱嚴，代莊也。師七歲，事禪德輝公，十有五雜染，二十受具戒，遊汴汝河洛間。甚久，從大德溫公，學《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sup>99</sup>朝廷賜溫公號曰多和國師、益公曰棲岩國師、廣公曰真慧國師，他們的弘法成就也得到認可。「印公碑」記載：「公以嗣法於棲岩，承教於真慧，其道蓋得之於孝岩之派多和之師、益公之師也。三老皆望高於世，未有封號。」

綜上所述，印公（1271-1337），壽 67，法名慧印，關陝人，先後在山西、河南等地隨多為高僧學法和受戒，精通《華嚴》《圓覺》《華嚴義疏》《唯識》《楞嚴》《因明》等經論，修持藏傳佛教時輪六支密法等，嚴於戒律，三度受戒，20 余歲就盛名于時，30 歲各處講經弘法，是位顯密兼修的高僧，有榮祿大夫、大司徒封號，銀印一品，地位尊崇，弟子眾多。慧印法師住持五臺山大萬聖佑國寺，護從英宗、帝師等遊歷五臺山並作華嚴法會，為社稷祈福。奉詔多次前往兩都講經說法，在大都弘法寺、大永福寺校勘經疏，並住持大都大承天護聖寺。慧印法師舍其所有，用於修建五臺山普門寺和大都寶雲寺。故此「印公碑」有「經莫大于《華嚴》，論莫奧於《唯識》，律莫詳於大《四分》，至於百法，窮法相之本，因明著立破之規，此而通則三藏殊，文思過半矣。公之於佛，以學以行，可謂博文絢禮者」。

<sup>97</sup> 《清涼山志》卷 5《帝王崇建》，頁 211 上欄 01。

<sup>98</sup> （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 4，頁 389 上欄 23。

<sup>99</sup> （明）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 4，頁 491 中欄 22。

